

林慶彰 主編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八編

林慶彰主編

第13冊

五四前後文化調和論研究  
——以杜亞泉和《東方雜誌》爲中心的考察

王代莉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五四前後文化調和論研究——以杜亞泉和《東方雜誌》為中心的考察／王代莉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序 10+ 目 4+302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八編；第 13 冊）

ISBN：978-986-322-684-0（精裝）

1. 五四運動 2. 學術研究

030.8

103001981

ISBN-978-986-322-684-0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八編 第十三冊

ISBN：978-986-322-684-0

## 五四前後文化調和論研究 ——以杜亞泉和《東方雜誌》為中心的考察

作 者 王代莉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字 數 31 萬字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十八編 16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五四前後文化調和論研究  
——以杜亞泉和《東方雜誌》爲中心的考察

王代莉 著

## 作者簡介

王代莉（1979～）：女，漢族，貴州省遵義人。2002年、2005年於貴州師範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分獲歷史學學士及碩士學位。2006-2009年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師從耿雲志先生，攻讀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博士學位。現就職於中共貴州省委黨校。發表學術論文近二十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500年清水江流域文明發展史研究》一項。參與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項目《清水江文書集成考釋》及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多項。

## 提 要

五四前後的文化調和論，因其言論溫和而理性，曾引起思想界的廣泛關注與激烈論爭。它主張以穩健的改革步驟，謀求東西文化的「調劑體合」，新舊思想的接續不斷，精神與物質的互補，對立雙方的協力共進，最終以創造新文化為其目的；提倡以理性的態度為指導，反對盲目從西，對西學實行「有條件的容受」，以科學的法則刷新固有文明；強調文化反省，努力使中國文化成為世界文化之一部分；欣賞多元文化並存中的「和諧」狀態。這種文化主張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下的產物，又深具中國文化底色。從調和論者的言論及實踐來看，他們雖在具體的文化建設主張上與激進的新文化運動者有著「先立後破」與「先破後立」的路徑選擇差異，但在建設新文化的目標上卻是一致的。其言論主要針對的是激進新文化運動者在理論上的極端主張及實踐中的過激行為，希望以「調和」的處方對其有所校正和補苴，與激進的新文化運動恰好形成互補。他們並非新文化運動的反對力量，也不是無原則的折衷派，而是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是新文化運動中一支相對理性、穩健的力量。但文化調和論終因理論上的缺陷及文化建設實踐的弱勢，導致其在激進主義高漲的五四時期，沒能得到更大多數人的支持而日漸沉寂。

# 序

呈現在讀者面目前的這本書《五四前後文化調和論研究——以杜亞泉和〈東方雜誌〉爲中心的考察》，是王代莉博士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她以杜亞泉及其所主編的《東方雜誌》作爲研究的中心，考察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及其以後一個較長時期不太受人重視的一股思潮，即通常被稱爲折中主義的思潮。從前，人們把杜亞泉與《東方雜誌》的文化調和論主張，簡單地歸結爲折中主義，一批了之，可以說沒做過深入的研究。近年來有人加以研究，似乎又有些走偏，把杜亞泉與《東方雜誌》上的言論奉爲至理名言，全盤肯定，忽略了當時的背景和其他思想派別的言論主張。王代莉此書，能夠本著研究和評判的態度來對待研究對象，超脫了以往學者們對文化調和論不加分析地一味讚美，或全盤否定的片面性。就此而言，此書很有理論價值和借鑒意義。

本書的論題，涉及到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許多基本問題。人們大概可以認同，近代中國思想文化上的折中主義多半都是針對激進主義而發的。爲此，我們有必要認真檢討一下激進主義，特別是要檢討一下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激進主義。

我們都知道，新文化運動之興起，源於少數先覺分子對政治革命與政治改革之失望甚至絕望，想從文化運動入手，先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將舊制度舊倫理束縛下的人解放出來，成爲克服了奴隸主義的，能獨立思考，自治自立的新人，再由這些新人起來締造一個真共和真民主的新國家。這個歷史運動，很有些類似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啓蒙運動。實際上，新文化運動最主要的領袖之一，胡適一向是這樣看待新文化運動的。但近年有人不承

認新文化運動具有文藝復興和思想啓蒙的性質。我本人仍然傾向於胡適先生的判斷。這裡不展開討論這個問題，讀者欲知其詳，可參看我發表在《社會科學戰線》上的文章。<sup>〔註1〕</sup>

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大力引進和傳播的新思想和新觀念的核心是個性主義和世界化的觀念。我在近年發表的多篇文章裏系統、深入地揭示了這一點<sup>〔註2〕</sup>。接受這些觀念影響的，首先是廣大的青年學生，他們思想比較單純，甚少先入的成見，所以容易接受他們的老師們所傳播並加以詮釋的新思想、新觀念。何況，頗受他們尊重的這些老師們都是既有國學根柢，又充分瞭解西方思想文化，所謂學貫中西的大師。於是，廣大的青年學生漸漸產生新的信仰和新的價值追求，也逐漸地改變自己的行為規範，對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的未來要主動擔負起使命與責任。他們躍躍欲試地要把從他們的老師們那裡學來的新思想、新觀念付諸實踐。恰好這時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之一，在巴黎和會上卻遭遇外交失敗，日本帝國主義竟然把戰前德國掠奪我山東的權利攫為己有，於是爆發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在新文化運動的基礎上發生的。新文化運動造就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觀念的青年，他們在數量上和精神素質上，都遠非清末民初時的青年學生們可比。尤其是他們大多掌握了一種表達思想，交流思想的極其有效的利器，就是白話國語。有了這個利器，他們不但能夠非常便利自如地表達自己的種種要求和願望，思想和主張，而且能夠很方便地與社會各階層聯絡，把自己的思想主張傳播出去，把廣大的人群——甚至包括工人和農民——發動起來，造成中國從未有過的大規模的社會動員。所以，我認為，若沒有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可能完全會是另一個樣子。

五四運動爆發後，極其迅猛地向全國擴展，遂使新文化運動所引進，所

---

〔註1〕 耿雲志：《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10期。

〔註2〕 參見拙著：《中國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趨向》，《歷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世界化與個性主義——現代化的兩個重要趨勢》，《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集刊》第1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問題與趨向》，《廣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此文的英文版見“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volume 1 number 2 december 2007 標題是 Modern China'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problems and prospects）；《中國近代思想的基本趨向及其主要議題——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耿雲志先生》，《歷史教學研究》2014年第1期。

生發出來的新思想、新觀念像決堤的洪水急速地向四方蔓延開來，波及到各個社會階層。新文化運動初起時，只限於一部分教育界、學術界和報刊界中人。到五四運動之後，廣大的青年學生、識字的職員，甚至略能讀書的學徒、店員、乃至家庭婦女，都通過報紙、刊物多少吸收到一些新思想、新觀念。到後來，即使許多不識字，不能讀書看報的人也因聽到學生們的講演，或街談巷議，而對新思想、新觀念略有所聞。所以說，五四運動的爆發和迅猛擴展，給予新文化運動以極大的推動力，使這場運動真正具有了廣泛的群眾性，並極大地加速了它的進展。如果說原來新文化運動還大體是由一群知識分子們進行從容的討論，那麼到了五四以後，則已是洪水蔓延或大火燎原。從積極方面說，五四運動極大地推動了新文化運動向橫廣兩方面擴展；從消極方面說，從此就不太容易進行從容的討論了，這不免給激進主義提供了機會。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激進主義有其深厚的社會政治根源。因為外受列強侵略、欺凌；內受專制主義的壓制和摧殘，有志救國和憂時之士，無不憂憤迫切。所以，歷次的政治改革與政治革命運動，都或多或少犯有激進的毛病。例如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等鼓動光緒日發數詔，策勵新政，但效果甚微。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不但想推翻皇帝，立即進入共和，而且還想使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其結果，除了使皇帝下臺，其餘幾乎皆無所成。

近代中國的基本歷史課題是獨立、民主、統一和富強，這就決定了政治問題的優先性。同時，這也就決定了，一切激進主義都首先來源於政治運動。

我們看新文化運動領袖分子中，凡比較激進的，都與其政治背景有關。如陳獨秀是清末的革命黨。在新文化運動中，他的言論總帶有不容人討論的氣勢。錢玄同在清末有一段時間與革命留學生們在一起，又是激烈反滿的革命家章太炎的學生。他在新文化運動中，是出名的激進派。他曾主張廢除漢字，理由是，漢字書籍絕大部分都是記載孔門學說和道教妖言的。他罵文學上的守舊派是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他責備胡適遷就舊派人物，反對胡適以討論的態度對待反對文學革命的人。魯迅也是大家公認的比較激進的人物。他在清末也參與了留日學生的革命刊物，也是章太炎的門生。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把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比喻為連續不斷的人肉宴席。他主張掀翻這宴席。他的激烈言論當然不止於此。還有另一個



著名的激進主義者吳稚暉，也是清末的老革命黨，還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在新文化運動中所說要把線裝書都拋到茅廁裏去，要求廢除漢字等等早已人所皆知。我舉這些例子，就是要說明，新文化運動中及其後所表現的激進主義是跟中國的政治有密切的關係的。

中國是個後發展國家，在西方發達國家，他們由中世紀到近代的過渡，差不多都要經歷二三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中間經歷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國語運動、工業化、科學進步、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哲學上的實證主義、懷疑主義、經驗主義、理性主義、經驗批判主義、實用主義、語義哲學、分析哲學等等。這些運動、這些思潮和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他們在幾百年的時間裏，從容發育、生長並且互相辯論，經受社會實踐的檢驗和磨洗，或被人接受，或被人拋棄；或被人改造，或被人修正；凡多少有點用處的就會保留下來，其餘的就成為歷史的陳迹。但在中國，這些東西都是在非常短暫的時間裏，一下子就湧進來了。一方面，人們不暇檢擇，不辨其是非，陷於困惑；一方面，對新思想、新觀念往往只是一知半解，各人任憑一己之興趣所近，認定一種，便以為是絕對真理，極力排斥其他。於是呈現出異說蜂起，諸流並進，各逞意氣，惟我獨尊；沒有從容討論的風氣，沒有妥協磨合的餘地。在這種氛圍裏，激進主義自是容易大行其道。

在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運動中，號稱穩健派的梁啟超、胡適等人，他們在主觀上，是瞭解思想文化的變動需要長期醞釀、涵容、互相討論切磋的過程的。所以胡適說過準備二十年不談政治。他們在引介和宣傳一種新的思想觀念時，多半採取從容討論和以理服人的態度。但他們同時也切身感受到保守力量的巨大。所以，他們常常不得不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批評保守主義的方面。梁啟超和胡適兩人都談到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的道理。所以，這兩位被認為穩健派的領袖，有時也不免會講一些激切的話，以對付守舊派。即使如此，胡適還是被認為與舊勢力「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註3）。

有趣的是，有些保守派批評和攻擊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責備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太偏頗和太激進。但他們反對新文化的態度、手段卻同樣是非常偏頗，非常激進的。例如嚴復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尤其反對白話文。然而，他這位以精神貴族自居的老前輩，卻根本不屑於與白話

---

〔註3〕錢玄同致胡適的信（1918年8月），見耿雲志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0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255頁。

文提倡者們作討論，並以「春鳥秋蟲」視之，「聽其自鳴自止可耳」。<sup>〔註4〕</sup>另一位反對白話文的老前輩林紓，除了上書蔡元培，上綱上線地攻擊白話文和新思想、新觀念的提倡者之外，還編寫影射小說，發泄自己的怨憤與痛恨之情。<sup>〔註5〕</sup>當時在北大讀書的張厚載，也是一位反對白話文與新文學的干將。胡適曾邀請他，要他把反對戲劇改革，替舊戲辯護的理由寫出來，由胡適把它發表在《新青年》上，以便展開討論。但這個張厚載，卻更熱衷於參與守舊派對新思潮的攻擊。他偷偷地將他認為可以攻擊新文化運動的材料提供給林紓去炮製影射小說，或直接給報紙提供不實消息，以達造謠惑眾的目的，如他炮製的所謂當局要把陳獨秀、胡適、錢玄同驅逐出京的消息即是一例。此事真相大白之後，使處世最溫和的蔡元培亦感到忍無可忍，乃布告全校，開除張厚載的學籍。後來由梅光迪、吳宓、胡先驕等人在南京創辦的《學衡》雜誌，其最初幾期幾乎是專門攻擊新文化運動的。這份由受過西洋教育的留學生們主辦的刊物，在對待新文化運動的問題上，卻同樣不講忠恕之道，也不要什麼紳士風度，也照樣採用謾罵、攻擊、無限上綱的大批判手法。例如該刊創刊號上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評提倡新文化者》，<sup>〔註6〕</sup>通篇只列罪名，沒有罪證，很像是舊時文人為當道者討伐異端而寫的檄文的腔調。此外，更有人直接使用恐嚇手段，寄匿名信，以炸彈相威脅<sup>〔註7〕</sup>。

守舊派的這種做法，對於像胡適這樣既懂得中國傳統的忠恕之道，又養成西方的紳士風度的人來說，不會引起過度強烈的反應。然而對於那些較有革命精神的人，或年輕氣盛，不肯居下風的人們，就很容易引起過激的反應。人們知道，在激烈的爭辯中雙方都難免會講出一些偏激和激烈的話。所以，我覺得，五四時期及其以後延續下來的激進主義，守舊派也是要負擔一部分責任的。

激進主義在中國社會中，在中國文化中，特別是在近代中國的社會和思想文化中，長期延續，不肯退出舞臺，甚至不肯退居邊緣。左傾教條主義和

〔註4〕嚴復致熊純如信（1919年7月24日），見王栻編《嚴復集》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99頁。

〔註5〕林紓致蔡元培書，見《公言報》1919年3月18日；林紓所杜撰的小說，《荊生》發表於上海《新申報》1919年2月17日，另一篇小說《妖夢》發表於同一報紙同年3月19～23日。

〔註6〕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載《學衡》第1期，1922年1月。

〔註7〕見拙作《蔡元培與胡適》，《耿雲志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頁。

極左思潮甚至把它變本加厲，為國家民族造成很大的損害，人們對它反感，痛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個人更是一貫反對激進主義的。但有些人把激進主義說成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種下的禍根，則是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的。

第一，中國近代的激進主義源遠流長，不自五四始。早在維新運動時期就有所謂「一切盡從西法」之說和譚嗣同的「沖決一切網羅」之說。而保守派反擊時，也大作「誅心之論」，滿紙滿篇充滿憤激之詞。在辛亥革命時期，則有批評所謂「醉心歐化」，「以不類遠西為恥」的言論。

第二，新文化運動中，比較激進的陳獨秀、魯迅、錢玄同、吳稚暉等人雖不時發表一些激進的言辭，但他們所提出的大多數主張，還是有道理的，不能一概以激進主義而加以抹殺。更何況，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人物，一些主要的新思想、新觀念的提倡者和闡釋者的胡適，他經常是以非常理性的平和的態度，與大家進行討論。他極力主張請反對派的人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為此，錢玄同甚至表示要退出《新青年》。

不僅如此，在五四運動以後，社會上，特別是青年學生越來越趨於激烈。胡適、蔡元培、蔣夢麟等曾多次發表文章勸誡青年要注意理性地對待各種問題。

應當說，近代中國的激進主義的根源是深藏在社會的內部，不是哪一個人，或哪一群人可以單獨承擔起責任的。這裡所說的根源，一是政治上，因國家民族面臨的威脅，救國的任務十分迫切。二是中國長期處於極端專制主義的壓制下，全無自由發表的機會，也沒有各種力量公開較量，然後通過妥協來解決問題的機制。所以，一旦原有的統治機器面臨崩壞之時，各種力量一下子如洪水泛濫，野火燎原，無法控制，各不相容，只認自由，而不知容忍。

為了克服激進主義，首先要使中國的政治走上健全發展的軌道，關鍵是要使民主在中國社會紮根落實。其次是在搞好教育的基礎上，盡力恢復、宏揚傳統的忠恕美德。忠與恕，其實就是自由與容忍。什麼時候，我們的同胞們都能充分領略並實行忠恕之道，什麼時候，激進主義便不再行時了。

一些確有學問根柢的保守主義者，因為害怕激進主義泛濫，使傳統文化和社會秩序破壞而不可收拾，乃拼死力攻擊激進主義，攻擊他們所提倡的新文化，客觀上顯示一種向後倒退的趨向。那些號稱留學西洋，寢饋西方文化

數年的留學生保守派人物，嘲笑新文化偶拾西洋文化之皮毛，自己則最有資格宣講西洋文化。實際上，因為他們不肯放下精神貴族的架子，所欣賞，所領受的不過是西方古典主義的東西，或是後來被稱為「後現代」的東西。當時的中國還是數十年來踟躕於現代化大門前的後發展國家，大力提倡西方古典主義或「後現代」的東西，豈不是文不對題嗎？

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各執一端，互不相讓。一些好心的憂時之士出而從事調停與折中，於是有所謂折中主義。從表面觀察，折中主義似乎是最可取的。然則，思想文化的演變，社會的進程，都是十分複雜的，遠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對於每一個個人，每一個團體，每一個派別而言，思想文化亦如社會一樣是一種客觀的東西，是一個不會沿著某人、某團體、某派別的特別意向發展和演變的客觀進程。折中主義者根據自己的主觀願望，提出某些東西可以向西方學習，某些東西不可以向西方學習；某些東西只可學習到某種程度就要止步，等等。他們像畫家作畫時，在調色板上，取甲種顏色多少，取乙種顏色多少，又取丙種顏色多少，放在一起調和，成一種非甲非乙非丙，又含有甲乙丙不同顏色的新色調。試問，有幾百萬、幾千萬，甚至是幾億，十幾億的人共同創造，又共同浸染其中的社會，以及思想文化，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製成嗎？所以說，折中主義是一種實踐中行不通的主觀主義。自然，同理推之，激進主義、保守主義也一樣帶有明顯的主觀主義。激進主義不顧客觀形勢，強使社會，或思想文化沿著自己設想的軌道和速度，超高速前進，稍不小心就會人仰馬翻，墜落懸崖，極其危險。而保守主義，同樣是不顧客觀趨勢，強使社會和思想文化，按自己的欣賞興趣，重回到古典主義的籠子裏，結果也必然是事與願違。

自然，我們不能就此得出虛無主義的結論，認為在新文化運動中，各種思想取向無一可取，全都是負面的，全都應予否定。不是的，我的意思只是說，在社會進程與思想文化演變中，不可過於理想主義，不可過於堅執某種主義，要切實觀察，順應發展的客觀趨勢，腳踏實地，努力做事。我把這叫做穩健進取的態度。首先要進取，承認社會和思想文化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此過程中雖然會有這樣那樣的曲折，有時稍有停滯甚至倒退，但終究會前進。有人藉口批評簡單化、絕對化的線性進化論而完全否定進步。這是難以接受的。進步是客觀趨勢，抹殺不了，否定不了。我所說的進步，就是社會和思想文化朝著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精神需要

的方向走，這就是進步，反之就是倒退。認識到社會與思想文化前進的趨勢，順應此趨勢的努力，就是可取的。但不可操之過急，不可任意躡等，憑主觀需要搞躍進，甚至是超躍進，那就是激進主義，是不可取的。

事實上，在任何發展進程中，人們的各種態度取向，常常是一個較完整的光譜。在倡新的人群中也可分成激進的，穩健的和相對保守的不同色調；在倡保守的人群中，也有較多兼容新事物者，較少兼容新事物者，和絕對反對新事物者的區別。至於折中主義，自然也非全調成一個色調。應該說，他們在社會發展和思想文化演變過程中，各起著一種角色作用。社會發展和思想文化演變的階段性結果乃是綜合各種角色作用而成的。大家都記得，在文學革命初起時，胡適堅持討論、說理的態度，不很滿意陳獨秀那種不容人討論的態度。但十多年後，胡適承認，若沒有陳獨秀那種猛進的精神，文學革命可能還須經歷長期的討論，才能取得勝利。足見他是承認激進主義有其特別的作用的。同樣地，保守主義、折中主義在社會和思想文化發展與演變的過程中都各自發揮了不同的作用。若沒有他們，其結果也就不同了。哲學家霍布斯說過，一籃子梨子，如果全部取出爛的，那籃子就不熱鬧了。當然，我決沒有把某一部分人群看作的是爛掉了的梨子的意思。我們永遠要承認世界是多元的，社會也是多元的，思想文化也是多元的。任何強行統一的想法和做法，都是行不通的；勉強行之，總會造成不良的後果。

總說一句：研究新文化運動，使我明白，思想文化的發展極大地受著社會政治狀況的影響。欲為中國新文化建設出力的人，應當認清大勢，看清方向，腳踏實地，努力工作。不諂上以邀恩寵，不媚俗以竊時譽，得寸則寸，得尺則尺，長期積累，必有大收穫。反之，如果急切求功，聽起來高調，看起來熱鬧，高潮一過，原來還在舊地徘徊。

最後，關於這本書，我再略說幾句。在這本書裏，作者對以往相關研究的追述頗為詳盡而客觀，作者在吸收前人的成果的同時，能夠超越他們的局限，獨立地展開自己的研究，得出許多具有創意的新結論。例如，作者對文化調和論的理論基礎和思想內涵及其特點進行深入分析，提煉出他們的一些很有價值的基本觀念，如關於對抗力的觀念，協力的觀念，接續主義的觀念等等。對於其思想內涵，也做了很好的揭示，指出，他們比較注重理性，反對盲目性，注意到民族精神與世界化的統一，等等。作者對文化調和論的思想淵源也做了比較全面的梳理，既指出其受到西方世界思潮變動的影響，又

指出中國傳統的中庸思想的深刻影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比較深入地分析了文化調和論在理論上的一些缺失和實踐上的不足，這些缺失和不足，不但限制了他們在當時的思想文化界的影響力，而且嚴重限制了他們在中國新文化建設上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我認為，這本書很值得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的學者們參考。

耿雲志 2013 年 11 月 30 日

寫於容膝齋



# 目

# 次

序 耿雲志

緒 論 ..... 1

第一節 選題緣由 ..... 1

第二節 學術回顧 ..... 7

一、五四前後文化調和論整體研究概況 ..... 8

二、個案研究情況 ..... 11

第三節 研究內容 ..... 21

一、研究對象的界定 ..... 21

二、框架與思路 ..... 23

第一章 文化調和論興起的國內國際背景 ..... 25

第一節 轉型期的文化變動及文化觀的流變 ..... 25

一、封閉文化體系的變動 ..... 25

二、轉型期文化觀的流變 ..... 26

第二節 國際思潮變動的外在刺激 ..... 33

一、「西方的沒落」與「東方文化救世論」  
的興起 ..... 33

二、西方人本主義思潮的出現 ..... 37

三、泰戈爾的東西文化觀及其影響 ..... 41

第三節 文化調和論的提出 ..... 43

|                                  |     |
|----------------------------------|-----|
| 第二章 文化調和論主帥與言論主場地：杜亞泉<br>與《東方雜誌》 | 47  |
| 第一節 杜亞泉與《東方雜誌》的調和取向              | 47  |
| 第二節 新舊思想能否調和之爭                   | 51  |
| 一、激進與調和兩種文化取向的分歧                 | 51  |
| 二、章士釗的新舊調和論及相關論辯                 | 63  |
| 三、杜亞泉與蔣夢麟關於何謂新思想之爭               | 76  |
| 第三節 東西文化之調和                      | 88  |
| 一、東西文明的「性質之異」與動靜調和               | 88  |
| 二、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力調和                 | 96  |
| 三、道德的因革損益                        | 102 |
| 第四節 離開《東方雜誌》後的調和言論及論爭            | 114 |
| 一、與余雲岫的中西醫學之爭                    | 115 |
| 二、與李石岑的新舊倫理之爭                    | 117 |
| 三、與朱光潛的情與理之爭                     | 120 |
| 四、《人生哲學》的調和傾向                    | 123 |
| 第三章 理論基礎及思想內涵                    | 127 |
| 第一節 理論基礎                         | 127 |
| 一、有序中的對抗                         | 127 |
| 二、協力主義                           | 138 |
| 三、分化與統整                          | 142 |
| 四、接續主義                           | 145 |
| 第二節 思想內涵與特質                      | 153 |
| 一、強調文化的調劑體合                      | 153 |
| 二、注重理性力量                         | 157 |
| 三、反對盲目倣仿西方                       | 160 |
| 四、以科學的法則刷新固有文明以創造新<br>文化         | 166 |
| 五、民族精神與世界化的統一                    | 171 |
| 六、反省的文化意識                        | 179 |
| 七、寬容的多元文化觀                       | 183 |
| 第四章 文化調和論的思想來源                   | 189 |
| 第一節 來自傳統文化的影響                    | 189 |



|                                     |     |
|-------------------------------------|-----|
|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庸底色 .....                 | 189 |
| 二、中庸是一種調和持中的理想 .....                | 191 |
| 三、「調和」釋義 .....                      | 195 |
| 第二節 對法國激進思潮的反思與對英倫調和傳統的欣賞 .....     | 197 |
| 一、對法國激進思潮的反思 .....                  | 197 |
| 二、對英倫調和傳統的欣賞 .....                  | 199 |
| 第三節 日本思想界吹來的風 .....                 | 202 |
| 第五章 文化實踐與建設理念 .....                 | 211 |
| 第一節 科學與思想啓蒙的先行者 .....               | 212 |
| 一、編寫教科書 .....                       | 212 |
| 二、介紹科學新知 .....                      | 216 |
| 三、在社會科學上的貢獻 .....                   | 216 |
| 第二節 新文化運動中的一支穩健力量 .....             | 218 |
| 一、對個性主義的提倡 .....                    | 220 |
| 二、反對立孔教爲國教 .....                    | 226 |
| 三、努力建立與世界文化的密接關係 .....              | 229 |
| 四、對新文學運動的支持 .....                   | 232 |
| 第三節 「先破後立」與「先立後破」：兩種文化建設理念的互補 ..... | 236 |
| 第六章 比較視野下的理論與實踐缺陷 .....             | 251 |
| 第一節 理論缺陷 .....                      | 252 |
| 一、對西學瞭解不深刻 .....                    | 252 |
| 二、概念含混與意義複雜 .....                   | 253 |
| 三、主觀的文化理想，經不起實踐檢驗 .....             | 259 |
| 四、理論與現實的錯位 .....                    | 261 |
| 五、對傳統的惰性認識不足 .....                  | 265 |
| 第二節 文化建設成績的弱勢 .....                 | 271 |
| 餘 論 .....                           | 281 |
| 基本研究資料及參考文獻 .....                   | 289 |
| 後 記 .....                           | 299 |